

陈云搞活经济思想与实践初探

姜长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陈云作为长期主管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领导人,他认为搞活经济对于增加生产、平衡财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与激发社会活力等方面非常重要;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对如何搞活经济以及搞活经济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系列的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陈云;搞活经济;思考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20)02-0033-07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20.02.005

作为长期主管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陈云关于搞活经济的思想与实践,在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实施国民经济调整和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

一、陈云认为搞活经济非常重要

(一)搞活经济是财政好转、增加生产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生产总过程中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其中直接生产过程是再生产过程的起点,起着决定作用。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起反作用。搞活经济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环节效率的提升,也即意味着更多的社会产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面临着国内外的不利情况,中国政府实行了“四面八方”的政策,陈云认为此举有利于改善国家的财经状况,1951年3月30日他在政务院会议讨论财政部1951年工作时指出:把城乡交流搞活跃了,把经济搞活跃了,财政情况就会好转起来^{[1][31]}。事实正是如此,国家通过实行“四面八方”的政策,城乡交流和经济活跃度大大增加,1952年基本上实现了国民经济恢复,国家财政收支实现平衡。

放宽对经济活动的过多限制,放手让群众去发

展生产,这有利于克服经济困难,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中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遭遇了严重的困难,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陈云参与领导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1961年5月30日他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的外贸专业会议华东会议上讲话指出: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油料也可以考虑采取这个办法。现在的毛病是卡得过死,种类越统越多,东西越收越少,搞得活一些,生产发展了,收购上来的东西自然就会多起来^{[2][89]}。经济调整过程中,国家通过实行开放集市贸易和扩大农民自留地等政策,使农村经济得以较快恢复。

陈云认为进行经济调整要以经济活起来为重要目标。1961年9月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上发言指出:基建规模和生产指标要退够。何谓退够?就是退到可靠的基础上,要以经济能活动周转起来为标准。只要经济活起来了,基建规模和生产指标就可以逐渐增加。现在粮食和物价已达到非常紧张的程度,如果工业投资再搞得很紧张,又会重复以前的错误。煤和钢材不能孤立地领先,要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在使经济全面活起来中领先^{[2][104-105]}。通过采取压缩基本建设和工业规模,精简城市人口,增加农业和粮食生产等措施,使

收稿日期:2019-11-29

作者简介:姜长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经史。

陷入困境的国民经济有了生机活力, 国民经济出现了好转势头。

(二) 搞活经济有利于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陈云认为, 搞活经济就是要使经济总量增大, 人民收入增加, 国家国力增强。1950年5月到6月期间, 当有人向陈云建议适当降低农民需要的名牌棉布价格时, 他指出: 现在的问题不是把每匹布的价格降低几角钱, 以减少农民的一点支出, 而是如何尽快恢复和搞活城乡物资交流,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的购买力^[175]。农民购买力提高以后, 有了改善生活和购买工业品的能力, 从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通过城乡交流, 搞活经济, 使得市场上的商品供应水平大大提高, 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951年10月25日陈云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中指出: 新开商业户增加, 城乡交流活跃, 失业人数减少, 公私关系进一步协调。……财政在国防经费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 对经济文化事业的投资仍超过去年。国家增发的通货, 既未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增加量, 也不比去年增发数字多, 因而保证了全国物价的基本稳定^[181]。物价稳定, 使人们免除了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心, 有利于人们福利水平的提高, 也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社会形势的稳定。

(三) 搞活经济有利于激发社会内生力量

政府、居民、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三大类经济活动主体, 构成了国民经济流程中的三个基本部门。搞活经济, 居民收入增加, 消费能力增强, 就业岗位增多, 企业经营状况改善; 政府财政收支增加, 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增强, 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良性运行的状态, 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增强, 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陈云1956年在八大的讲话提出在所有制改造以后, 经济还要搞活, 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同时还提到要发挥市场调节的问题。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较大, 同时又囿于一些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不正确解读, 造成社会经济生活中活力不够, 社会内在的力量无法激发出来。

1978年底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政策后, 使社会各经济主体的活力得以释放, 社会经济发展很快。陈云看到并鼓励这一历史进程。1982年11月22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讨论五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上国务院关于“六五”计划报告稿的发言中, 就搞活经济问题指出: 这三年情况有很大变化, 商店东西很多, 人们把票子带在身上, 好的就买, 不好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不见了。……现在搞的责任制大大超过了我那时的意见。所以, 我说打破“铁饭碗”是一场革命, 其意义不下于公私合营。干多少得多少, 没有一个人可以揩公家油。各方面都搞活了, 内在的力量可以发挥出来了^[2358-359]。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 就是搞活经济的过程, 也是社会内在力量不断发挥出来的过程。

二、陈云对如何搞活经济的探索

搞活经济很重要, 但搞活经济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具体到中国这样国情复杂的东方大国, 搞活经济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云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一) 搞活经济要正确处理城乡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的城镇化率在1950年为11.18%, 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接近90%。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陈云认为正确处理城乡关系, 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是建国初期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1950年11月27日陈云出席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闭幕会并讲话指出: 会议确定的财政增收措施, 大部分要落到农民头上, 为此, 要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 使农民负担得起。这不仅是关系农村的问题, 而且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证明, 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农副产品卖出去了, 可增加农民购买力, 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 减少或消灭城市失业, 提高城市购买力, 进而增加国家税收, 减少财政困难, 物价更趋稳定。因此, 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1103-104]。12月2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提出1951年财经工作的重点, 即: 搞好城乡交流, 发展农业生产, 搞好国营企业经济核算, 严肃财经纪律, 做好有计划地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1110]。同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陈云《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问题的报告》。《报告》说: 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 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 这是中国经济的钥匙。农村活了, 城市也就活了^[1111]。

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 还注意到了合理控制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 以便使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够

发挥作用。1951年2月13日陈云主持中财委第四十七次务会议时发言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去年一年集中了大量资金,并通过国营贸易,起了活跃城乡内外物资交流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好转的重大作用,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1]121-122}。

1952年6月11日陈云在全国统战工作汇报会议上讲话,论述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问题,指出:当前市场还没有完全活跃起来,停滞现象有所改进,但大的改进还需要一个时期。因为“五反”,相当多的资本家或者不进货,或者不做买卖,使国营贸易的比重被迫增加。这种增加是必要的,否则,农村土产没人收购,工厂产品没人买,整个社会经济就要停顿,农民就要骂娘,工人就要失业。但是,要把国营贸易比重掌握在百分之二十四五这个尺度,不要提高或降低^{[2]121-122}。

1954年3月19日陈云在同姚依林的谈话中指出:三四个月来,公营商业在零售贸易中的比重猛进了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而且是批发零售两线并进,这样的速度太快了。目前,华北已出现城乡联系隔断、农村市场死滞的现象,华东、中南将会相继告警,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淡季一到,问题将更严重。解决这些问题,总的方针是国营及合作社不再前进,或者稍退一步。在农村,国营除棉花、烤烟的收购外,总的要停止前进,粮食和油脂的收购要退一下,恢复农民间的市场调剂,其他方面也要松动;合作社不再前进,而且要审查其货价;对出口小土产的收购要大大放开,组织私商下乡联购;国营商业要少向合作社批发一些布匹和小百货,把这些商品转给私商;县、市集镇要多开物资交流会^{[1]306-307}。

1956年10月25日—28日陈云出席国务院五办召集的农村市场汇报会议。28日,在讨论市场价格、农村贸易和市场管理问题时指出:农村贸易的开展,对刺激农业社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商品供应,活跃城乡市场,满足人民需要,弥补社会主义商业的不足等,都有很大的作用。但自由市场放开后,会因为有些农业社和农民进行商品贩运而影响农业社的巩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要对农村贸易作出一些规定,加以限制^{[1]493}。

1956年11月11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就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发言,指出:7月全国各地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开放后,城乡物资交流活跃了,暴露了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又官又商、环节多、人浮于事的弊病,反映我们过去那套机构需要改变,不改

不行。但开放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开放无边,有些东西放开后的价格涨得过分,农业社可以做哪些生意没有明确规定^{[1]498-499}。陈云提出,要组织集镇的市场管理委员会,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要管。

1961年6月3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东北组会议上发言,指出,只要我们有物资与农民交换,物价自然会稳定下来。整个市场的好转,需要时间,也需要有步骤。一是要多给农民生产商品,先活跃农村,农村活跃了,整个城市都会活跃起来^{[2]92}。1961年6月27日—7月11日陈云在青浦县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插话中指出:关于农村商业问题。要允许小商贩分散经营,共负盈亏、自负盈亏都可以,以活跃市场^{[2]96}。农业方面,除粮食、棉花及其他主要经济作物由国家掌握外,其他都可由农民自由经营,可以到自由市场出售。由于中国劳动力多,土地少,这样做是适合我国情况的。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1961年所有社队都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并坚决退赔。会议还确定了农村工作的若干具体政策,主要是:(一)除继续实行超额交售余粮的奖励办法外,再拿出10亿元专门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适当提高油料、生猪和禽、蛋的收购价格;拿出25亿元作为退赔补贴。(二)社员自留地由原规定平均每人占耕地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七。(三)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

(二)搞活经济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促使买方市场的形成

市场是生产要素商品等交换的重要场所,能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经济运行质量。1952年5月21日—6月5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会议认为,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物价下跌,交易停滞,营业萧条,许多私商陷于半停顿的状态是不正常的,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发展过快,在贸易上所占比重过大。为此,要对私商采取先活跃市场后收税、先收当年的税后退补以前偷漏税款的办法,并把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零售方面的比重控

制在百分之二十五(上一年为百分之十九)^{[12]19}。

1956年8月23日陈云讲话指出:特别是1953年以后,对工业实行统购包销,商业自上而下派货,农产品独家收购,市场管理很严格,带来了消极因素。主要是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这种消极因素过去就有,现在应该取消。过去只有国家市场,没有自由市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这种自由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市场,因为它不是盲目的市场,而是国家市场的助手^{[13]98-99}。市场存在的前提就是要有多个市场主体的参与,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春天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北京城里连挑担卖糖豆的也变成公私合营了,都拿三十多块钱的固定工资,“铁饭碗”了^{[12]358}。缺少多个市场主体的参与,搞活经济就缺少了基本的支撑。

1956年9月11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三十七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等文件。陈云指出:计划和自由的问题,事无大小,统统计划不行。个体生产是集体所有制的补充。这种自由市场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都是国家统购。如果没有这个百分之二十五的自由就搞死了,这个百分之二十五的自由是必要的。现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恢复1953年的情况,搞死了不行。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是小计划、大自由。他们是大的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而小的方面比如一个工厂却是有计划的。我们是大的方面有计划,小的方面常碰头。我们要大计划、小自由,目前大小都要计划不行。现在,大工厂是牺牲了很多产品才获得产量提高的^{[13]103}。

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

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1961年1月14日—18日陈云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会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关于开展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情况的汇报,通过了《关于农村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规定社员自留地占当地土地比例由百分之五调整为百分之七,至少20年不变;确定养猪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允许私养母猪的政策;鼓励社员发展小规模家庭副业,放手活跃农村集市。

1979年3月8日陈云撰写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指出:(一)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完全正确。(二)1917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1949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这样做完全对,但缺点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即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要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现在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由于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三)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即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所以存在着该严的不严,该宽的不宽的现象。(四)忽视市场调节的另一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思想上没有“利润”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五)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计划机关和工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认识,如不纠正,必然碰壁。“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六)在今后经济的调整 and 改革中,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1983年6月1日陈云得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拟将他《在计划经济范围内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推销和自由选购》一文收进《调查和研究》合订本后,委托秘书建议他们在文前按语中加一段话,说明对一些日用百货等零星商品采取“选购”的办法,在当时还只是个设想,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因为那时可供商品少,不像目前市场上许多商品供应充裕。只有出现了买方市场,才称得上真正的“选购”^{[2]376}。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三)通过改革搞活市场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了很大的历史作用,但其在资源配置、经济调节等方面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通过改革来消除计划经济的弊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搞活经济的一个重大步骤。

1981年9月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指出:目前搞的经济管理体制,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亚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一件大事。个别工人调皮捣蛋,就停止他的工作,这在我们开国以来历史上没有过。企业不能开除工人,这套东西是从苏联来的。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但要看到,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改革复杂^{[2]321}。11月25日陈云在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时指出:这不是说不合理的东西不要改革,必须改革。“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三句话一句都不能少。这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体制改革用的也是这个道理^{[2]327}。

1984年10月20日陈云同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主持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时作书面发言指出: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打破“大锅饭”。“大锅饭”实质上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2]416}。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

事实上也是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从农业农村开始,迅速推行城市企业和其他领域,改革促进了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使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搞活经济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对于搞活经济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混乱的国民经济,采取多种手段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我们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该如何管理经济,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1961年1月,中国实行了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这其中重要的举措就是开放集市贸易,发挥市场在调节生产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在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9月7日陈云由上海乘火车返回北京时同前来送行的江苏省公安厅负责人谈有关市场和投机贩卖等问题时指出:“活而不乱,管而不死”,这在当前还办不到。要经济活,就可能有点乱。如果用政治手段管,一管就死。只有用经济手段管,才能管而不死。例如,投机倒把的人卖鸡蛋,一个五角钱,国家卖,一个一角钱,这就好办了。可是,目前我们在经济上没有这个力量。根本原因是物资缺乏,消费能力与物资供应之间有很大差距。现在全国消费能力约为七百亿元,由于缺少猪肉和棉布,仅这两项就造成一百二三十亿元的缺口。这个缺口,日用工业品很难补上^{[2]106}。当时我们通过实行高价商品,开放集市贸易等措施,一方面初步保证了市场供应,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人民币的信用,确保了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稳定。

(二)搞活经济要有国家计划引导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从当时的国情出发,认为搞活经济要有国家计划的指导。1982年4月3日邓小平在北京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也只是开始。“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2]338}同年11月4日陈云听取宋平、柴树藩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当前经济情况的汇报。当汇报到有的地方只强调搞活经济,忽视

统一计划时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总要有个“笼子”。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2]356}。

1982年11月22日陈云在讨论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关于“六五”计划报告稿的发言中也就搞活经济问题指出:我在同宋平、柴树藩谈话中把计划经济和搞活经济比作笼子和鸟的关系。这个话不是我发明的,是黄克诚讲的。搞活经济要有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不一定一个省就是一个“笼子”,“笼子”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区。如果没有这个“笼子”,计划就要被冲垮。我们的“笼子”——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也是经常要调整的。总之,经济一定要搞活,但不能离开国家计划^{[2]358-359}。

1982年12月2日陈云会见前来住所看望他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代表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搞活经济和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政策效果显著。但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国家计划就是“笼子”。“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可以跨国跨洲。“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2]360-361}。

陈云反复强调搞活经济要有计划的指导,根本的还是要求经济发展稳健有序,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要把搞活经济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加强中央经济权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规模和经济复杂程度等大大增加。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不可或缺。

1985年3月6日—13日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市召开。会议指出,今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在改革的方向、目标上坚定不移,在改革的方法、步骤上稳扎稳打,谨慎从事,把继续搞活同加强宏观管理结合起来,确保改

革初战胜利。

1985年9月23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会上讲话指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2]434-435}。

1988年中国实行价格闯关的政策,一度通货膨胀严重。对于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10月8日陈云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困难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谈话中讲了意见: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2]471}。此后,针对中央财政出现的困难,陈云提出要加强中央的经济权威,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大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败得失。

(四)搞活经济要加大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整治

搞活经济,意味着市场主体的增加和市场交易活动的增加,意味着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更加强烈,有时会助长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对于搞活经济所带来的问题,陈云是注意到了的。

1983年10月20日陈云听取郑拓彬关于外贸亏损问题的汇报,当汇报到各地只注重外汇收入,对外削价竞销,不顾人民币盈亏时说:肥水落到外人田。汇报中陈云还指出:现在外贸乱得很。你们的胆子不能再大一点,能不能走一走老路?这几年外贸亏损和外贸体制改革有很大关系,如果走老路,亏损不会那么多。先把它“搞死”,“先死后活”。走两年老路,略加改良,看一看哪种办法好^{[2]390}。

1985年9月24日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六次全会上作书面讲话时指出: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仅十几个省市就办起了两万多个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违法分子、不法外商相勾结。“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正在严重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无论对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都要依法处理,否则就是失职^{[2]436}。

陈云关于搞活经济的思想 and 实践,在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实施国民经济调整和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这需要我们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发挥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正确处理好城乡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社会主义市场法制建设,加强

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责任编辑 李卫民]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3]陈云文集(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Chen Yun'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Invigorating Economy

Jiang Changqi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Chen Yun, as the leader in charge of the party and state'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work for a long time, believed that it was very important that invigorating economy can increase production, balance finance and economics, improve social welfare level and stimulate social vitality. Starting from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he made a series of explor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how to invigorate economy and the problem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economic work.

Key words: Chen Yun; invigorating economy; thought and practice